

政权对立与文化融合

金代中期诗坛研究

金代中期诗坛的三种审美趋向：

第一是由政治、宗教、哲学因素而形成的普遍性特征——尚自适；
第二是由地理、历史、民族因素而形成的地域性特征——崇气格；
第三是由文化、教育、艺术因素而形成的时代性特征——重典雅。

杨忠谦◎著

人民出版社

政权对立与文化融合

——
金代中期诗坛研究

杨忠谦
◎ 著



人民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 惠 pphlh@126.com

责任校对:杜凤侠

封面设计:王玉浩

版式设计:雅思雅特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政权对立与文化融合——金代中期诗坛研究/杨忠谦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8

ISBN 978-7-01-009022-1

I. ①政… II. ①杨… III. ①诗歌-文学研究-中国-金代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11220 号

政权对立与文化融合

ZHENGQUAN DUILI YU WENHUA RONGHE

——金代中期诗坛研究

杨忠谦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0.875

字数:300 千字 印数:0,001-2,000 册

ISBN 978-7-01-009022-1 定价:30.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金代家族与金代文学关系研究”阶段性成果
重庆文理学院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序

时值新中国 60 华诞即将来临之际,海内外辽金文学研究的同仁齐聚京郊名胜红螺寺旁的钟磬山庄,举行中国辽金文学学会的第五届年会暨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有七十余人,大家济济一堂,畅谈辽金文学研究近些年来深入开拓,又都浸染在共和国 60 年大庆的喜悦气氛之中,享受着北京秋光的美好,更显意气之勃发。期间杨忠谦博士到我房间恳谈移时,甚为相得。忠谦将他的文稿送给我,并希望我为这部著作的出版写一篇序。我因前些年对辽金文学史下过一段工夫,且较早地出版了《辽金诗史》等拙著,现在也在辽金文学学会做一点组织工作,承蒙忠谦的信赖,加之我对这个论题尤有兴趣,因此欣然愿意为本书命笔作序,一是我和忠谦的缘分,二是可以借此深化我本人对金代这段时期诗坛的了解。

我和忠谦相识还是他在大同大学执教的时候,大同大学前身的主体部分是山西雁北师范学院。忠谦彼时在师院的中文系讲授古典文学。雁北师院非常重视辽金文学研究,并且专门成立了辽金文学研究室,忠谦当时是这个研究室的负责人。和忠谦一见之下,觉得其人与其名甚为吻合,忠厚谦和,恰是我对其人的深刻印象。其后不久,忠谦就到华东师范大学去攻读博士学位,师从著名学者黄坤教授。忠谦对于辽金文学研究不能释怀,其博士论文还是以金代诗史研究为选题。黄先生是以古典文献为其学术专长的,忠谦在黄先生门下学到了文献学的真功夫。这在他的这部书稿中体现得是很明显的。

读了忠谦的这部文稿,感到非常欣喜。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金代家族与金代文学关系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作者对于金代中期的诗坛的考察,不是停留在文献考索的层面,更不是仅凭着印象和推演对金中期诗坛作一般性的描述,而是在丰富的文献基础之上,对于世宗、章宗诗坛在金代诗史上的地位作了颇为深刻的分析,呈现了金中期诗坛在时间和空间、文化和审美等不同维度的风貌。我在15年前出版的《辽金诗史》中对大定、明昌时期的诗歌创作有很多的分析 and 评价,并以之作为金诗在其初期“借才异代”之后,“国朝文派”崛起、金诗盛季到来的重要阶段。因为《辽金诗史》是着眼于金诗整体上的框架建构,且因《辽金诗史》是在一个更大的视阈下,对辽金两代的诗歌史作初辟草莱的框架性描述,尚未能对大定、明昌诗坛进行细部的、聚焦式的研究,加之我的思维习惯也还是以大处着眼者多而微观审辨者少,所以,在《辽金诗史》中关于大定、明昌诗坛的论述还是相当粗略的。《辽金诗史》之后,虽然辽金文学研究有了许多新的重要成果,在很多问题上有了突破,有了明显的跃升,但尚未看到将金中期诗坛作为一个独立的、集中的研究课题进行全景式的研究。忠谦的这部书稿,显然是第一部这样的研究成果。

事实上,作者通过以此为选题的精深研究过程,将金诗的分期研究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在某种意义上来看,它不仅是对大定、明昌诗坛的客观的考察,而且还为分期研究提供了一个探索性的模式。当然,我们并不希望文学史研究上的模式化,更不提倡用条条框框来套活的文学史实,因为文学史实是一个客观的存在,它并不是完全按照某种既定的规律或逻辑来生长的,而是有着千差万别的样态。那种动辄就概括出几条规律来为文学史“定性”的研究,其实是很幼稚也是简单化的。但是我们并不排斥研究主体以某些理论视角来透视文学的客观存在,这恰恰是文学史研究的必要方法。然而,作为前提的是对文学史实的尊重。这一点,在这部论文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因为忠谦全然是从对大定、明昌诗坛的客观生态中发现和梳理出来的几个角度。它对于分期研究来说是具有明显的启示意义和借鉴作用的,但却又是活生生

的,真切地反映出金代中期的诗歌创作情形。这段时期是金代文学史上的重要阶段,忠谦将其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阶段进行考察,固然是为了选题的可行与合理,却又是为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可资参考的模式。

之所以选择金中期诗坛作为研究范围,并非仅仅出于书稿选题的方便,而是基于作者对金诗发展的历史性认识。选择大定、明昌,是因为在作者看来,这是一段非常特殊而又非常重要的时期,是金诗的转型期。具体而言,处于文人心态的转变阶段,国朝文派的创立阶段,文学创作的成熟阶段,以及社会思想的开放阶段。在这部论文的格局里,作者对于世宗、章宗时期诗坛作了文化的、审美的、艺术的和因革通变的多方面考察。从文化角度,作者研究了当时的文化政策对于金中期诗歌的影响,对其科举方面、儒学方面和宗教方面都有较为全面的分析。本书从审美的角度来观照大定、明昌诗坛的创作,以“气格”、“自适”和“典雅”为这段时期主要的审美取向,而且还看到这几种审美取向的变异性,指出明昌诗人整合了“气格”和“自适”两种诗风,形成了刚柔相济、清真淡宕的创作思想。值得称道的是,作者在这里所揭橥的这几种审美取向,并非是美学理论中的现成范畴,而是作者从世宗、章宗诗坛的众多诗歌创作和对诗人的研究中深切体会到而又加以提炼的。在中国古代美学中,不乏“气格”或“自适”这样的说法,而在金中期的诗坛上得到了突出的体现,作者以之作为大定、明昌诗坛的主导审美取向,是颇中肯綮的。这种研究方法,不是用现成的模式来套活的文学史实,而恰恰是从层积深厚的文学史土壤中提升出来的。譬如“气格”,作为诗歌的审美范畴,在中国古代诗学中也不是那么常用的,而且论者在用的时候,罕见有人作明晰的阐释,或者说,“气格”作为审美范畴也许还很难说是已经成熟的。忠谦在其书中则从金中期诗坛的特定文学史实出发,对于“气格”作了追本溯源的分析,并使大定、明昌诗坛上那些标举“气格”的篇什得以呈露出来。作者进一步揭示了这一时期诗歌创作“气格”的几个特征:地域性、主体性、圆融性。关于“自适”,作者指出其表现形式,又着重揭示其社会经济原因和民族原因,同时指出佛

教、老庄思想对其产生的影响所在。第五章《诗歌艺术特征论》对于这一时期丰富繁多的诗歌现象作了全方位的探查,指出大定、明昌诗坛在体裁方面的多样性和体式方面的丰富性。体裁指大的诗体分类,如古体诗、近体诗和楚辞体诗歌等;体式则是指具体的诗歌表现样式,如回文体、集句体、连珠体、寓言体、渔父体、天随子体等,这种体裁和体式的艺术分析,使是书对大定、明昌诗歌创作的描述更为深入、更具本体特色。但是,这里面也还有可以商量的地方,如回文体和集句体等和渔父体及天随子体是不是在同一个平面上的,前者更多的是体现为技巧的性质,后者则是特殊的风格。是书对大定、明昌诗歌所做的意象分析是非常细致的,也是充分反映了金中期诗坛的创作成就的。作者将金中期诗坛的诗歌意象分为山水意象、香草意象和动物意象以及“残缺”意象等,并对这些意象进行了颇具理论色彩的分析,如论“香草”意象的主体性特征、女性化特征和对象化特征,等等。第七章《诗歌因革论》,则是探讨了大定、明昌诗歌的继承与创新的因素所在,如对“陶谢风流”的继承,如“苏学盛于北”造就的诗歌风貌,如“以唐人为旨归”的诗学旨趣等。作者还专论了少数民族诗歌以及南北诗歌的互动等论题,都是从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的实践出发而生发的论题,因此,在这些全面具体而又具有理论深度的论述中,我们对金代诗史的中期阶段,有了一个全景式的而又深刻的印象,同时,也在这种研究中呈现出文学史的分期研究的成功范例。

忠谦原在山西大同工作,那里是辽金史和辽金文化最有根基的地方之一,忠谦以辽金为其研究对象已有多年的;现在到了山城重庆执教,还是对辽金文学“情缘”不断,其科研项目和发表的文章主要的还在辽金文学方面,令我心存感佩。近些年来学术界瞩目于辽金文学研究的进展,这个领域已不再是文学史阵营中的“小萝卜头”了。无论是成果的数量或者研究水准,都在不断地呈现上扬的态势,很多博士生、硕士生都以辽金文学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或论文选题,研究队伍也在不断扩大,看到辽金文学会议上那么多洋溢着自信的青春面孔,我对我们从事的事业充满了希望和信心。这不仅是辽金文学研究的兴盛发达,且

更是伟大时代和国家为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所创造的美好机遇。当下的辽金研究成果,较之以往更加深入和细微,同时又具有更多的理论含量。作为这个研究队伍中的一员,我由衷地欣喜。

忠谦的这部专著,体现了辽金文学研究的当下进展,是可以给同仁们一点惊喜的。忠谦比我年轻许多,可以期许在学术研究上令人刮目相看的前景。

这也是我对辽金文学研究同仁的期许吧。

中国传媒大学审美文化研究所 张 晶

写于2009年京华深秋之时

目 录

序 / 1

绪论 / 1

一、金代中期的时代背景与民族特征 / 2

二、“国朝文派”的文学渊源 / 4

第一章 金代中期诗坛的文化背景 / 10

第一节 社会背景与文化政策 / 10

一、社会文化背景 / 10

二、科举政策及其文学贡献 / 14

第二节 文化思想的转变 / 17

一、金世宗的史鉴意识 / 17

二、文化开放政策 / 27

第三节 诗歌主题的变奏 / 36

一、现实主义作品主题 / 39

二、史鉴意识作品主题 / 41

第二章 “国朝文派”的北方文化特征 / 55

第一节 对“气格”的普遍崇尚 / 56

一、“气格”理论的发展 / 57

二、“气格”说的逻辑基点 / 58

第二节 “气格”的诗歌实践 / 59

一、崇尚“气格”的审美风范 / 60

二、追求“气格”的诗歌实践 / 62

第三节 诗歌“气格”说的特征 / 66

一、地域性 / 66

二、主体性 / 70

三、圆融性 / 72

第三章 汉化背景下“国朝文派”的典雅趣向 / 76

第一节 诗人生活典雅化 / 76

一、朝廷礼乐制度规模化 / 76

二、诗人队伍宫廷化 / 78

三、诗人生活艺术化 / 83

第二节 诗歌创作技巧化 / 88

一、《明昌辞人雅制》 / 89

二、尖新派代表王庭筠 / 91

三、逞奇斗巧的王寂诗歌 / 93

第四章 自适诗风的形成 / 97

第一节 自适诗风形成的原因 / 97

一、社会经济原因 / 97

二、民族因素 / 99

第二节 自适诗歌的多元表现 / 106

一、云泉是处堪为乐，轩冕从来只累人——诗人的“小隐” / 106

二、身虽市朝寄，心与功名疏——诗人的“中隐” / 116

第三节 隐逸自适的思想渊源 / 121

一、佛教思想的濡染 / 122

二、老庄“齐万物”的影响 / 124

三、三教合一思想的融会贯穿 / 126

四、诗人的自适情趣 / 131

第五章 诗歌艺术特征论 / 133

第一节 科举对诗歌的影响 / 134

一、“辞赋”科与诗歌艺术之关系 / 134

二、科举对文风的影响 / 137

第二节 诗歌体裁的多样性 / 139

一、古体诗 / 139

二、近体诗 / 150

三、楚辞体诗歌 / 154

第三节 诗歌体式的丰富性 / 157

一、回文体 / 158

二、集句体 / 159

三、连珠体 / 163

四、寓言体 / 165

五、渔父体 / 168

六、天随子体 / 170

第四节 诗歌用典的多元化特征 / 172

一、密集用典,表现文人趣味 / 172

二、反意用典,强化主体情感 / 179

三、组诗用典,隐含多元主题 / 185

第五节 诗歌句式的丰富性 / 189

一、炼句 / 191

二、炼字 / 193

三、对仗 / 195

第六章 诗歌的意象 / 198

第一节 山水意象的倾心经营 / 199

一、诗人普遍的山水情结 / 200

二、山水意象的多样构造 / 203

第二节 “香草”意象的比兴寄托 / 205

一、主体性特征 / 207

二、女性化特征 / 212

三、对象化特征 / 215

第三节 动物意象的文化内涵 / 218

一、“下视平芜低”的“鹰”意象 / 219

二、“奔腾多奇龙”的“马”意象 / 221

第四节 “残缺”意象 / 224

一、“残缺”意象的表现特征 / 224

二、“残缺”意象的文化精神 / 226

第七章 诗歌因革论 / 230

第一节 陶谢风流到百家 / 231

一、强烈的“三径”情结 / 232

二、兴寄高妙、真淳简淡的美学特征 / 238

三、从文学意义的学习到生活旨趣的无意识渗透 / 240

第二节 苏学盛于北 / 242

一、“苏学盛于北”之原因的考察 / 242

二、金人对黄庭坚的接受 / 252

三、对苏、黄诗风的反思 / 256

第三节 以唐人为旨归 / 259

一、金诗学唐的进程 / 259

二、王若虚、王庭筠崇白、抑白之争 / 267

三、学杜理论的建立 / 269

第八章 南北文化融合下的少数民族诗歌 / 275

第一节 女真族诗人的文学创作 / 276

一、女真文学的发展 / 276

二、金代中期的女真文学创作 / 281

第二节 其他少数民族诗人的诗歌创作 / 289

一、渤海诗人的文学贡献 / 289

二、契丹族代表诗人及其诗歌 / 291

第九章 政权对立下的南北诗文互动 / 295

第一节 政权对立下南北诗坛的诗歌主题 / 300

一、孝宗诗坛的涉金之作 / 300

二、金代文人的涉宋之作 / 308

第二节 南宋文献北传 / 310

一、南宋诗文作品北传 / 310

二、理学的北传 / 313

第三节 金代文献南传 / 318

一、金诗词作品南传 / 318

二、金代史籍、历象之类书籍入宋 / 320

三、赵可文集入宋 / 322

后 记 / 328

参考文献 / 331

绪 论

金代是北方女真贵族建立起来的政权,有一百二十多年的历史,而金代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20世纪后期开始,越来越多的学者致力于金代文学的研究,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研究也逐渐向纵深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逐渐注意到了金代文学的价值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积极进行研究,成果丰硕。在金代文学批评史方面,周惠泉先生的《金代文学学发凡》;诗歌方面,张晶先生的《辽金诗史》、《辽金元文学论稿》和詹杭伦先生的《金代文学思想史》;词学方面,赵维江先生的《金元词论稿》、陶然先生的《金元词通论》皆属扛鼎之作。这些著作从宏观和微观方面对辽、金两代文学创作、文学思想和文学理论的发展进行了认真的梳理,填补了辽金文学研究的空白。专题研究也取得了很大进展。胡传志先生对于《中州集》的系列研究,刘达科先生对于《河汾诸老诗集》的专题研究,也都取得了不小的成绩。狄宝心先生的《元好问年谱》、王庆生先生的《金代文学家年谱》等,对金代作者的生平考订、文学交往等进行文献整理与研究,对金代文学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多数学者将世宗、章宗朝作为金代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一段不可分割的特殊时期。笔者在学界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对这一时期的文学成就重新加以审视,希望能够得出进一步的认识。笔者认为,金代中期(世宗、章宗时期)诗坛标志着金诗的转变,主要是体现为:第一是文人心态的转变阶段;第二是国朝文派的创立阶段;第三是金代文学创作的

成熟阶段。它在社会背景、文化政策、作家心态、创作题材等诸方面,都与金代前期(即借才异代时代)和卫绍王当政以后皆有很大的不同。因此本人将金代中期作为相对独立的一段时期加以考察,故本书着重探讨这段时期的诗歌创作。

一、金代中期的时代背景与民族特征

世宗之前的金初四朝,其诗人主要由辽、宋入金的作家群所构成。由宋入金的文人相对较多,著名诗人有宇文虚中,张斛、滕茂实、朱弁、洪皓、蔡松年、高士谈、吴激、马定国、祝简、孙九鼎、施宜生、刘著和晁会等。他们的经历和庾信相似,诗风也显示出南北融合的特点。他们的诗歌本是宋诗的移植,但由于不同的地域背景、文化氛围的影响,已经具有一些北方文学的雄豪特色,表现出由宋诗向金诗过渡的特征。他们在客观上充当了文化传播的使者,其创作为日后金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此时,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下,女真皇族中产生了以完颜亮为代表的一些诗人。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即借才异代时期)诗坛的引导主题由两大基调组成,即抒发去国怀乡的悲凉情思和崇尚高情远韵的隐逸心态。宇文虚中和吴激等人代表前一种倾向,蔡松年代表后一种倾向。

金世宗登基标志着金朝进入和平、稳定的发展时期。随着金朝对汉文化的主动接受,生活在金国的各族人民在文化上互相吸收、融合,代表金诗特色的“国朝文派”诞生。大定时期形成的“国朝文派”又称“中州文派”或金源文派。这一称谓最早由金中期文学家萧贡提出,后得到元好问的确认。“国朝文派”是元好问针对金初“借才异代”时期主要由宋儒一统文坛的情况而提出的,其实质是要确立金朝自己的文学地位。

元好问《中州集》卷一《蔡珪小传》中云:“国初文士如宇文太学、蔡丞相、吴深州等,不可不谓之豪杰之士,然皆宋儒,难以国朝文派论之。故断自正甫为正传之宗,党竹溪次之,礼部闲闲公又次之,自萧户部真卿倡此论,天下迄今无异议。”由元好问这段记载来看,“国朝文派”的提出并非出自偶然,而是有一定的权威性。倡此说者萧贡(公元1158—1223年),历仕世宗、章宗两朝,在文学、政事上有突出贡献和影响。元

好问曾评价萧贡说：“泰和、大安之间，名德雅望，朝臣无出其右。”（《萧斋诗序》）萧贡诗文成就也很大，元好问称其“不减前辈蔡正甫。”^①这样看来，“国朝文派”由著名官员兼学者的萧贡提出，说明这种说法在当时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再加上金末元好问加以确认、总结，使得“国朝文派”在文学史上更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张晶先生《辽金元文学论稿》一书列有专篇《“国朝文派”：金诗的整体特征》，对“国朝文派”有专门论述^②。张晶先生明确指出了“国朝文派”与文学史中一般意义上的文学流派的明显不同。他指出，“国朝文派”不是仅指金诗中某一流派，也不是指某一时期的创作，而是指金源诗歌区别于宋诗乃至其他断代诗史的整体特色。它在这个层面的内涵是很丰富的，同时又是动态发展变化的^③。按照这一认识，“国朝文派”的发展脉络是从蔡珪开始，经过大定、明昌诗坛党怀英、王庭筠等“主盟风雅，提倡后学”^④再经过贞祐南渡以后以李纯甫、赵秉文为代表的两大诗歌流派的努力，一直到金亡前后出现的“一座难以企及的高峰”——元好问。张晶先生认为，元好问的创作，恰恰是“国朝文派”的最佳代表。“如果说，其他诗人可以代表‘国朝文派’的某一侧面或某一阶段，那么，元好问的诗歌创作，则使金诗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包容了‘国朝文派’的全部内涵。他把诗的形式之美与内在的慷慨雄放之气熔炼得炉火纯青。”^⑤

张晶先生分析了“国朝文派”的产生以及“国朝文派”的特殊性，同时张晶先生还特别论述了“国朝文派”发展过程中的几个重要阶段。其中金代中期是“国朝文派”的创派期。在这个阶段，在女真文化与汉文化的相互渗透、影响的社会背景之下，“国朝文派”正式形成。先后几位领袖人物和众多重要作家都各自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国朝文派

① 金·元好问：《中州集》卷五，四部丛刊初编本。

② 张晶：《辽金元文学论稿》，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49-61页。

③ 张晶：《辽金元文学论稿》，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53页。

④ 《金诗选·例言》。

⑤ 张晶：《辽金元文学论稿》，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58页。